

论章太炎的“群学”思想及其对氏族史的研究

王 磊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710119)

摘 要: 二十世纪初,章太炎在西方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开始反思传统史学,在探索文明史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就章太炎关于中国近代“群学”和氏族史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及两者间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 章太炎;《虬书》;群学;氏族史

章太炎在《虬书·尊史》一文中对于传统史学表现了深深的不满,他说:“自唐而降,诸为史者,大氏陈人邪!纪传泛滥,书志则不能言物始,苟务编缀,而无所于期赴。”既然传统历史体裁“不能言物始”,那么出路又在何处呢?章太炎则明显的受到西方社会学说的影响,提出“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他指出中国史学典籍多以记事为宗,而缺乏关于氏族演化、社会物质成果制作、创造等方面的物质文明史的记载。章太炎对于研究文明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即要求作史者,必须明事物变化之理,且须有可依据之章程,方可为之。下面将要论述的章太炎关于“群学”和氏族史的探讨即是在文明史的范畴之下进行的。

一、西方社会学对章太炎史学观的影响

19世纪末以来,西方近代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逐步传入中国,然而社会学作为19世纪中叶才在西方兴起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它在传入中国之后,便对传统史学造成了重大冲击。较早将社会学译介到中国的是严复,章太炎作为一名关心时运的学者,对于当时的社会变局和西方的思想学说是保持高度关注的,同时,他对于社会学的引入中国也

起到很大的作用,并且自身也深受西方社会学的影响。章太炎与曾广铨合作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节译为《斯宾塞尔文集》,连续刊载于《昌言报》(1898年)。1902年,章太炎翻译了日本学者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此书可算作我国译介最早、叙述最完整的社会学著作,先于严复的《群学肄言》(1903年)和《社会通论》(1904年)。在《虬书》重订本中有不少涉及到历史类问题的文章,便都融入了社会学的观点,如《原学》、《订孔》、《学变》、《序种姓》、《方言》、《定版籍》、《原教》、《订礼俗》、《尊史》等。章太炎逐步将进化的观点融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

二、章太炎对“群学”的探索

自严复于1895年初在《原强》一文中将西方社会学译作“群学”之后,章太炎对于“群学”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章太炎基于先秦学者对于“群”的理解基础之上,结合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与理论,阐释了自己独到的“群学”思想。古代学者将“群”理解为人的种群或族群,而近代学者将其扩大到整个社会。

章太炎受到荀子关于“群分”思想的影响,荀子关于“群”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王制》和《富国》两篇文章中。在《王制》一篇中,荀子首先肯定了人类能

作者简介:王磊,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章炳麟著,徐复注:《虬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85页。

够合群的积极意义,“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随后,他又提出人之所以具备合群的条件则是因为人具备“分”和“义”,“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又说:“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最后,荀子归结道:“人生不能无群”并且“不可少顷舍礼义”,这样就将等级名分、道义总结为人类可以合群的条件。在《富国》一篇中,荀子再三强调“明分”能够使“群”和谐的重要性,他说:“群而无分则争”,“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又强调“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当然,荀子也顺带指出了离群索居则会导致“不相待则穷”的局面。我们知道章太炎一直比较推崇荀子的思想及其文风。在其1900年前后所写的《菌说》一文中,章太炎引用《荀子·王制》篇中内容以阐发自己的观点,“是故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他族之侮;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可见,在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章太炎赋予“合群”以新意,以达御辱求存之道。随后,在《馗书》中,章太炎则较为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群学”思想。

章太炎在《馗书》的相关文章中论及“群学”内容时,不仅融入了西方社会学相关思想,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西方政治学说的运用。这也体现了章太炎在治学过程中参证中西的特点。他在《馗书·明群》(初刻本)中就设计出了一幅“合群明分”的社会蓝图:“四民莫不有州居,而今之合群明分者,莫亟于学士,是何也?将以变法为辟公,必使天下之聪敏耳目,相为视听,股肱毕彊,相为勋宰,则始可以御内侮,是故合群尚已。”可见,章太炎眼中的理想社会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集团管理的,颇似柏拉图之理想国。在《原变》一文中,章太炎同荀子一样对离群索居之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合群”符合人类生存进化之理,人只有在“群”中才可以互相竞争,否则就会造成“人迫之使入于幽谷,天阨天明,令其官骸不得用其智力者,亦萎废而为虞蚩”的退化局面。最后,章太炎从更深层次指出:“山林之士,避世离俗以为亢者,……然而其弊,将挈生民以为虞蚩。”再次点明“合群”对于人类的积极意义。

我们从《明独》一文中可以看到章太炎在“群”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独”的理念,在当时可以说是令人耳目一新,能够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诚然,“独”的概念在传统儒家中早已有之,到了晚明的刘宗周则系统地提出了“慎独”的命题。然而,章太炎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之下,提出了基于个性解放为目的的“独”的思想,毫无疑问地丰富了“群学”的内容,赋予了“群学”新的意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提倡的“群己权界”在章太炎这里亦有所回应,以往我们往往过于重视严复的译著《群己权界论》(又名《论自由》)及其所代表的思想,对于章太炎相关的思想却有所忽略。

章太炎指出清末之时乃是“天地闭,贤人隐之世也”,这样一个武备废弛、政治颓败的时代,则更需要合群之人才。他所理解的“群”、“独”关系是这样的“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可以理解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还要对公众的事务、权益有所参与和贡献。他批判了三类不能称为“独”的人,其一“卓诡其行,遽然与俗争”者称为“鸷夫”;其二“厚其泉贝,膏其田园,守之如天府之橐”者称为“豢夫”;其三“深谿博林,幽间以自乐”者称“旷夫”。章太炎进一步阐发“群”与“独”的另一层关系为“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那么所谓“群”则是在“独”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是一种承认个性张扬前提下的“合群”,即是保证个人的权利边界不可动摇。最后,章太炎又呼吁道:“与群而成独,不如独而为群”,这就表明了人类个体在社会中,应该保持独立而超群。以上章太炎阐明了“群”与“独”的辩证关系,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深刻,这是对君主专制时代自由权利的呼唤和呐喊。章太炎在文章中还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通过表彰杭州的汪曾唯,从而道出了他心中具备“大独”精神的人的特点:“至性恫天下,博爱尚同,拘录以任之,虽贾怨不悔,其群至矣,其可谓独欤?”章太炎表达了对于社会出现具备“大独”精神之人的渴望之情,然而现实之世却是“大群之将涣”且“求独而不可得”,^⑩所以作者寄希望于未来社会的启蒙和变革。

章太炎在《馗书·尊史》一文中,挖掘《世本·作

①②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7页,第138页。

③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7页。

④章太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⑤⑥⑦ ⑩章炳麟著,徐复注:《馗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第309页,第494页,第485页,第487页,第491页,第494-496页。

篇》的历史价值时也不忘提出人民“合群”的重要性,上古之民由于居住分散,使得各自的生产经验和工具难以交流,所以往往难以促进技术更新。原因乃是“此所谓隐匿良道,不以相教,繇民不知群故也”,遂引述《管子》中言为之证明,“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可见“合群”思想在章太炎的观念中是贯之如一的。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不同的学者针对中国人“不群之恶性”皆纷纷提出自己的“合群”主张。梁启超在《新民说》一书中针对中国人“不群”列出四种原因:“一曰公共观念之缺乏”、“二曰对外之界说不分明”、“三曰无规则”、“四曰忌嫉”,又指出“如傲慢、如执拗、如放荡、如迂愚、如嗜利、如寡情,皆足为合群之大蠹”,最终还是要靠提升国民道德来实现。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的描述可以使我们看到康有为因中国人团体涣散而开列的药方,康有为认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康有为扯起了孔教的大旗欲凝聚人心。然而,章太炎却有另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团结人心在于感情,有两件事情最重要:“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从宗教角度来提升人群之道德,章太炎与康有为可谓是不谋而合。不同的是,章太炎则“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他提倡国粹,并且“不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而这历史包括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以上与康有为的倡导孔教是完全立异的,也显示了他们两人对于国民“合群”问题的不同见解。

三、章太炎重视氏族历史之研究

章太炎之所以重视氏族历史的研究,也是伴随着20世纪初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而兴起的,当时德国民族主义史学传入日本、中国,对国内学者产

生了重要影响。先有梁启超撰《新史学》以辨明人种之分,后有陶成章撰《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1904年)以及刘师培撰《中国民族志》(1905年)。而章太炎在《馗书》(手定本,1900年)中亦有《序种性》、《尊史》两篇文章主要阐述姓氏、民族历史的变迁。可以说,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民族史学最早的开创者。

章太炎在《馗书·尊史》一文中引述刘知几《史通》中关于修《氏族志》的内容:“凡为国史者,宜各纂《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章太炎继刘知几言论之后加案语道:“甄别华夷之说,自金、元至今,尤为切要。氏族作志,非以品定清浊,乃以区分种类。斯固非流俗所能知也。”可见,章太炎强调给民族作志的目的在于明确华夷民族之界限,以最终达到“排满”革命之效果。在《尊史》一文中章太炎还在重新审视传统典籍的基础之上,挖掘出以往为学者所忽略的《世本》一书,他对《世本》中的两篇《帝系》、《氏姓》进行分析,褒扬其“贤于《中候·苗兴》无訾程计数矣。夫整齐世系,分北宗望,成而观之,无瑰特”。此语乃是称赞《世本》是了解古代帝王世系、名号和古代氏族演变轨迹的绝好材料,并在《春秋左传读·叙录》中称:“传非一书,《内传》、《国语》、《世本》三者,皆《春秋》之传也。”章太炎独具慧眼推崇《世本》一书,值得学术界更进一步深入研究。

章太炎之所以撰写《序种姓》,目的乃是为续接顾炎武曾设想之《姓氏书》,旨在考辨华夏本姓和胡虏蕃姓,以严“夷夏之防”。在此文中,章太炎指明了他的民族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用血缘的源流代替文化高下作为辨别、区分民族的依据,这显然是与康有为立异的。他指出:“夏后兴,母系始绝,……自是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氏复远迹其姓以别婚姻。”女子称姓,所以别婚姻,使血统不相紊乱,而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章太炎欲在文字记载的基础之上区分“自然民族”和“历史民族”,他认为《世本·帝系》可以作为最早的氏族志资料,“故有《帝系》、《世本》,掌之史官,所以辨章氏族,旁罗爵里,且使椎髻鸟言之族,无敢干纪,以乱大从”。章

(下转第40页)

① 章炳麟著,徐复注:《馗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02、803页,第793页,第787页,第221页,第221页。

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94-596页。

梁启超著,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744页。

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5-7页。

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国学大师陈寅恪指出:梁陈制度为隋唐制度的三大来源之一。范文澜曾经说过:“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东晋南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由此可见“偏安一隅”的南方政权对于华夏文明的贡献有多么大。而作为南朝最后一朝的陈朝,更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如果没有陈霸先及其继承人的努力,南方的经济、文化不会在内乱后的短短三十余年间就得以恢复;没有六朝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也许大唐盛世的出现还要推迟很长一段时间。

“天下陈氏出江州,江州先祖在长兴。”鸦片战

争时候的陈化成、清末的陈天华、辛亥革命的陈英士、民国元老陈立夫、陈果夫,以及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丰功伟绩的陈独秀、陈云、陈毅等,都是陈霸先的后裔。台湾陈立夫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陈武帝故宫”匾额,如今悬挂在陈霸先故居。

综上所述,陈霸先出身寒门,起家下吏,从一个平民成长为一代英主明君,除了天时地利的时势造就外,其自身的英略才智才是其成功最主要的原因。陈霸先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正如卞孝萱先生所说:“在南北朝北强南弱的形势下,誓不投降,智勇抗敌,保卫南方最后一个汉族政权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有功的陈霸先,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上接第101页)

太炎辨明种族历史的目的乃是为了“排满”革命而做理论和舆论之准备的。遂有后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所述,“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

章太炎在辨明“历史民族”形成过程中,阐述了中国自《世本》记载上古帝王世系及氏姓沿革之后,中国自晋以后直到宋代形成了撰写谱牒之学的传统,原因是“中国故重家族,常自尊贤”,正是中国具有这一传统,所以中国的宗法制“萌芽夏、商间,逮周始定,以适长承祀”。章太炎分析了华夏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合了一大批非五帝后裔的种族,在此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因部族、国家战争而造成的掠夺和奴役他族人民的现象,章太炎以同情的笔调对因为封建宗法制造成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现象进行了挞伐,并对由于掠夺战争引起的“十等之法,隶以下迭相君臣,其名则丧,实故在也”的局面依然存在表示不平之情,我们可以看到章太炎渴望社会平等的人文情怀。

四、结 语

章太炎于1907年3月发表《〈社会通论〉商兑》一文,其中谈到用民族主义改造宗法社会的构想,首先他分析了中国自古及今宗法社会之演变,“古者宗法行于大夫、元士,不行于齐民;今者宗法行于村落素人,不行于都人士”。而乡间自成之村落“则有祠堂以相系联,而决事听于族长”,随后他又指出:“且今之民族主义,非直与宗法社会不相一致,而其力又有足以促宗法社会之镕解者。夫祠堂族长之制,今虽差愈于古,亦差愈于欧洲。要其仆速之体,褊陋之见,有害于齐一亦明矣。……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则曰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未来的社会将发展成为“惟军国社会是务,而宗法社会弃之如脱屣耳矣”的局面,以达“合群”之旨,从而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独立。由此,我们看到横亘在民族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有民族主义的兴起,还有传统宗法社会的影响,如何实现民族历史新的延续和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现代转型,如章太炎这样的近代学者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①② 章炳麟著,徐复注:《尙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第255页,第251页。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5页

章太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第333、334页。